
生活垃圾分类与社会建设

戴星翼¹

一、垃圾分类有利于实现社会建设目标

生活垃圾分类说到底，是要求居民以自己的举手之劳做一点于社会有利的事情。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类似的事情有赖于我们习以为常地去做，不求回报地去做。大家都去做了，整个社会的公德水准会不断提升，社会也因此一点点地美好起来。例如，行走在路上，多走两步将手中的空奶茶杯投放到垃圾箱；扶起摔倒的小孩子；地铁的先下后上。这些事情的共同点就是我们的付出微不足道，却有利于社会。

这些行为的养成靠的是“教养”：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幼儿园和小学老师的教诲；好的带头人；以及日常生活中人与人的相互影响，包括规劝；如果可行，也应该包括惩罚。生活垃圾分类的技术目标是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但除此之外，还应该有所谓的社会目标，那就是将我们的市民教化成为具有环境意识、公德心和社会责任感的现代社会公民。

正因为如此，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唯独不能用金钱作为手段。就像警察不应该拿着糖果，去激励那些不乱穿马路的行人，好人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重，仅此而已。有个居民区，从20世纪70年代以前直至90年代，每逢周六家家户户都有人到公共场所义务劳动，靠的是有个好的居委会，以及几十年如一日养成的风气，而非因小恩小惠动员了千家万户。

因此，以“绿色账户”这种奖励式的手段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很难取得成功，即使有关部门大力推行，这种措施也是没有未来的。说过去不成功，从运行上讲，是其高成本。居民将湿垃圾送到投放点，由专人接收验收后刷卡积分，可能还要兑付绿色账户奖励的日常用品，这一过程产生的全是成本。请注意，湿垃圾是无价值乃至负价值的，却要承担上述一系列环节产生的人力成本和货币成本。大致上，通过这一途径分离出来的湿垃圾，每吨成本在三千元以上。

当然，根本上的不成功，还在于以下两点。其一，账户模式的本质，是用蝇头小利吸引居民参与到生活垃圾分类中来。那么，不被奖励机制吸引的居民有多少？他们应当如何参与？前文也提到，“账户”运行成本过高，许多街镇抱怨开销太大吃不消这种模式在可持续性和普及性上都不禁让人打上问号。其二，是“账户”的退出机制。这个问题其实已被讨论多时，问题在于，既然该模式吸引的只是部分图小便宜的居民，那么，一旦小便宜消失了，结局可想而知：不仅一哄而散，恐怕还会出现麻烦。“绿色账户”出现的深层原因，是群众工作的畏难思想。

二、日本的生活垃圾分类以及我们的问题

日本官方的生活垃圾其实也是四分类。在此基础上，社区也就是市町村以专项收集为目标，进一步增加可回收物的类别，有的地方分类可多达十余类，也是基于可回收的目的而设的。

四分类分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粗大垃圾和资源垃圾。可燃垃圾包括厨余垃圾、报纸、纸箱、纸盒、杂志、旧布料、包装容器等。不可燃垃圾包括金属、玻璃、破碎的家电制品、陶瓷器、塑料等。粗大垃圾包括白色家电类（电视机、空调机、冰箱/柜、洗衣机）、金属类、家具类、自行车、陶瓷器类、不规则形状的罐类、被褥、草席等。上述三类垃圾的丢弃方法是：首先，测量垃圾的大小。最长的部分的长度为50cm以上的物品被认定为大型垃圾，2m以上以及70kg以上的物品不收集，需要预约大型垃圾受理中心处理。其次，按照长度交完粗大垃圾处理费用之后丢弃。资源垃圾包括饮料瓶、茶色瓶、无色透明瓶、可

作者简介：戴星翼，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以直接再利用的瓶类。资源垃圾的丢弃方法是：罐清空后冲洗，然后放入透明或半透明的塑料袋丢弃。喝过的饮料瓶在丢弃之前就需要以下几个步骤：喝光或倒光；简单水洗；去掉瓶盖；撕掉标签；踩扁，最后根据各地的垃圾收集规定，在“资源垃圾”日拿到指定地点，或者丢到商场或方便店设置的塑料瓶回收箱。为了提高再生产品的质量，回收中心也会将回收来的废弃塑料瓶中的异物、瓶盖及商标纸去除后，进行压缩打包成瓶砖，再提供给资源再生企业。

这样的分类有着很强的体系性，换言之，对前端提出的要求基本上是自末端的需求。其生活垃圾最主要的部分是可燃垃圾，之所以如此分类，是因为日本的生活垃圾处置以燃烧为主。不可燃垃圾的出路，可以作为路基或用于填海。资源垃圾特别重视饮料瓶，因为瓶片的价值很高，是重要的纺织原料。之所以“资源垃圾”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种类繁多，不那么强调“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而是尽可能地焚烧处理，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的人工昂贵，低价值的废弃物就被放弃。其次，回收利用也是有成本的，不仅是货币成本，也包括环境成本。如废纸的回收利用，仅脱油墨就会造成很重的污染。

相比之下，上海当前的垃圾分类系统性还存在问题。干湿分开的目的是什么？当初提出的时候是因为当前垃圾中水分或湿垃圾太多，从而导致燃烧不充分。但现在的情形已经反过来了，垃圾中热值太高，乃至超过了焚烧炉的承受能力。更加成问题的是湿垃圾，单独分离之后，就必须建设独立的清运处置体系。即使总量不变，一个系统变成两个系统，从经济学上讲其效率是下降的。湿垃圾的处置方式一般是堆肥，但不能作为农田基肥使用，因为不能保证某一堆湿垃圾中完全不含有毒有害物质，影响食品安全，于是湿垃圾堆肥的唯一出路就是用于林地绿地。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第三十八条为此要求“市绿化市容、农业农村部门应当会同市市场监管部门研究制定本市湿垃圾资源化利用标准，鼓励和支持开展湿垃圾资源化利用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的研究制定和推广实施工作。”对此我们如何理解？众所周知，湿垃圾因家庭条件、区域、季节变化等因素各有不同，又该如何制定利用标准呢？该条款还要求“本市相关政府部门应当支持在公共绿地、公益林的土壤改良中优先使用湿垃圾资源化利用产品，支持符合标准的湿垃圾资源化利用产品在农业生产领域的推广应用”“农村地区应当就近就地就近对湿垃圾进行资源化利用；鼓励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住宅小区将湿垃圾处理用于单位绿化、居住区绿化、家庭园艺。”请注意，都是“应当”而非必须。在这么多“应当”之下，湿垃圾堆肥究竟被消化了多少，剩下的部分到哪里去了？

可以设想湿垃圾就近就地处置的模式。例如以街镇为基本单元，在大片绿地中设置堆肥设施。堆肥则施用于本地区的公共和社区绿地。这种就近模式有利于降低垃圾处置成本，也能够最终解决湿垃圾分类处置的系统性问题。

生活垃圾分类的高度细化，也可以称之为专项收集。细化到什么程度？以织物为例，最好能分为羽绒专项、羊绒专项、纯棉专项、牛仔专项等小类。混杂的织物直接拉丝作为原料，其价值很低。其中原理与地条钢差不多，没办法形成标准。这一炉钢与下一炉的成分是不一样的，于是质量根本不能信赖。混杂织物同样，这一堆与下一堆废弃织物的成分也不可能相同，于是只能用于低端用途。而如果将羽绒等作为专项收集，其价值会比混杂织物数十倍地增加。专项收集在日本已较为常见，具体方式是定时定点投放。一周内何时投放什么，居民要不厌其烦地知晓所有细节，并认真执行。当然，这是需要情怀以及时间积累的。以举手之劳让生活更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而对个人并无多少直接好处，但大众如果能够普遍做到，社会文明水平会上一个大的台阶。

三、以生活垃圾分类为抓手推动社会进步

日前有报道说某小区强制推行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并将每个楼层的垃圾桶撤了。结果居民七嘴八舌，都说不方便，乱扔垃圾的现象剧增。需要指出，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是必要的。因为一旦这一模式形成，分类投放才能有效执行，否则监管成本过高会导致政府无法承受。只有定时定点了，分类的各种困难才更容易解决。更何况，这确实也没有增加老百姓多大的负担，无非让大家拎个袋子多走两步。对此许多人居然反对，根本原因不是其他，而是老百姓被“宠坏”了。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忽视公民教育，忽视了社会责任感的培育，忽视了大众良好公共行为的养成。过度强调“民有所呼，我所有应”，让有的人

误解为老百姓只是公共服务的享受者，而不是公共责任的承担者。高铁老赖等在社会上横冲直撞肆无忌惮的行为，就是我国长期无视公民教育的恶果。现代社会必须是现代公民社会，是强调权利与责任边界明晰的社会。该承担的责任而不承担，必须接受惩罚。有必要通过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推进强化社会的制度体系，逐步养成市民的社会责任感，这是比生活垃圾分类的环境意义更为重大的社会价值所在。

另一个重要问题在社区形成与普通居民血肉相连的骨干队伍，这是包括生活垃圾分类在内的许多工作能够长治久安的基本保证。

建国初的上海家庭甚少有双职工，一般是男人工作，女人持家。为了全社会的防空躲避国民党飞机，需要有一支能够带动老百姓的骨干队伍。这支队伍的人员只能来自家庭妇女。于是，党组织就物色了那些年轻、热心、进步的家庭妇女，组成了最早的居委会。这批年轻的女性基层干部，又被老百姓称之为“小辫子干部”。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小辫子们”成为了城市基层社会的栋梁。她们不仅带领老百姓躲飞机，其后，“小辫子们”的使命转变为组织和带领群众建设自己的家园。以里弄为单位，她们与居民一起通阴沟、清除垃圾、平整场地道路、扶贫帮困、扫盲识字。可以说，那些年基层社会的建设成就，是我们城市现代化历程上的丰碑，怎样评价也不为过。

1997年，笔者访问了一些“大妈干部”，记得有一位是上海最早的那一批“小辫子”之一。我们见面的时候，她已经办了退休手续。说起自己的工作，她充满了不舍和自豪。她神情中最为自豪的，是说这样一段事实之时：这些年我分管的片区有近三百户人家，每一家我都上过门，他们的家人我都熟悉，有事都招呼得动，凡是小夫妻打闹、家里人怄气、邻居间吵架，多数最后总找到我。像她这样的大妈，又像是干部，又像是群众。正因为这种特质，使她们能够真正地融合于居民之中，又由于她们的热心，从而能够带着拖着拉着前后左右的居民一起向前走。没有她们，群众只能一盘散沙。虽然许多人在自己的单位里是领导、骨干，但回到家，还真的需要“居委会大妈”这样的粘合剂，凝聚成为我们社会的坚实基础。

生活垃圾分类是一张考卷，既考居民，也考政府。考居民的，是人的公德心和社会责任感。考政府的，是基层社会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而交出的答卷是否优秀，还有赖于社区是否存在一支足够热心的骨干队伍。世殊时异，现在的社会在许多方面已有别于当年。而当年的那种精神如何传承下去，值得我们思考。